

中國大陸 當代詩學

系統研究一九五〇年代至
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當
代詩歌理論問題

於可訓
——著

中國大陸當代詩學

作 者 / 於可訓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陳彥廷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4 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19 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3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35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中國大陸當代詩學 / 於可訓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
資訊科技, 2013.08

面；公分. -- (語言文學類；PG1032)(文學視界；
26)

BOD 版

ISBN 978-986-326-144-5 (平裝)

1. 新詩 2. 詩評

820.9108

102013245

目次

導論	5
上編 古典與民間詩學的復興 ——20世紀50至60年代的詩學	
第一章 詩歌創作的轉換和詩學理論的嬗變 ——50至60年代詩學的創作背景和發展概況	41
第二章 核心理念：在古典與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 ——毛澤東的詩學思想及其理論影響	57
第三章 回歸傳統：對新詩格律的再度探索 ——新詩形式討論中的詩學問題	83
第四章 走向民間：對民間詩歌的極度推崇 ——新民歌討論中的詩學問題	125

下編 「現代」與「後現代」詩學的崛起
——20世紀70至80年代的詩學

第一章 詩歌創作的復甦和詩學問題的凸現 ——70至80年代詩學的創作背景和發展概況	153
第二章 核心理念：藝術革新和詩歌的現代化 ——70至80年代詩學的焦點問題和主導思想	179
第三章 重塑詩魂：對新的美學原則的追尋 ——新潮詩歌的詩學問題	205
第四章 再造詩心：對生命存在之詩的體認 ——「後新潮」詩歌的詩學問題	253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291

中國大陸 當代詩學

於可訓
—
著

目次

導論	5
上編 古典與民間詩學的復興	
——20世紀50至60年代的詩學	
第一章 詩歌創作的轉換和詩學理論的嬗變	
——50至60年代詩學的創作背景和發展概況	41
第二章 核心理念：在古典與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	
——毛澤東的詩學思想及其理論影響	57
第三章 回歸傳統：對新詩格律的再度探索	
——新詩形式討論中的詩學問題	83
第四章 走向民間：對民間詩歌的極度推崇	
——新民歌討論中的詩學問題	125

下編 「現代」與「後現代」詩學的崛起
——20世紀70至80年代的詩學

第一章 詩歌創作的復甦和詩學問題的凸現 ——70至80年代詩學的創作背景和發展概況	153
第二章 核心理念：藝術革新和詩歌的現代化 ——70至80年代詩學的焦點問題和主導思想	179
第三章 重塑詩魂：對新的美學原則的追尋 ——新潮詩歌的詩學問題	205
第四章 再造詩心：對生命存在之詩的體認 ——「後新潮」詩歌的詩學問題	253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291

導論

提到中國當代詩學，讀者定會發問，當代是否有詩學存在？提出這個問題，不外乎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整個當代文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著一種極端政治化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的存在，一切文學樣式皆成了政治的工具，詩歌也不例外。既然如此，詩也就如一切文學樣式一樣，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本性；本性既失，又何來研究詩的本性的詩學可言？其次是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反差極大的旅程：十七年詩歌逐漸走上一條極端政治化的道路，到「文革」時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結束以後的詩歌首先從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開始，爾後又出現了一種遠離政治的個人化（「表現自我」）傾向，經過了這樣的一個自我反叛的歷程，前後又存在著如此大的反差，又怎麼能在這個基礎上建構起一個統一的詩學理論。再次是中國自古以來似乎就少有成體系的詩學理論，歷代留下來的一些詩話詞話大都是一些散金碎玉自不必說，就是經過革命以後的新詩，迄今為止，似乎也未見有一部成體系的詩學論著。有鑒於此，懷疑當代是否有詩學存在，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這當然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即使是在極端政治化的十七年，也仍然有人在思考詩歌問題，而且為著政治的需要，還集中討論過一些重要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問題。在這

些思考和討論中，就孕育了當代詩學的萌芽因素。在「文革」結束以後的新時期，十七年的詩學理論雖然在新時期遭到了新潮詩人和詩歌理論家的顛覆，但在這個前提下建構起來的一種詩學理論，相對於十七年的詩學理論來說，只能說是另一種不同的表現形態，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十七年詩學的客觀存在。恰恰相反，正因為有這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當代詩學才顯得更有張力，更其豐富多采。至於詩學理論的成體系與否，似乎更多地是一個中西理論思維的差異問題，不能據此以西方體系化的詩學為標準來判斷中國當代是否有詩學存在。當然，這裏也有一個需要說明的問題是，我並不一般地反對成體系的詩學，也不認為中國古代詩話詞話的散金碎玉就是詩學的一種完善的形態。我的意思只在說明，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思維特點，也有各自對於詩歌問題（包括其他文學問題）的觀照方式，因而一個民族也就有各自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的詩學。而且，詩的問題也如其他精神文化現象一樣，還與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密切相關，對詩的問題的思考也就不能不打上這些方面的深刻烙印。這也是要影響到各民族的詩學在不同的時代會出現千差萬別的表現形態。換言之，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詩學理論的民族性和時代特徵問題。

本書把當代詩學定位在當代入對於當代詩歌的思考方面，認為當代詩學是當代入對當代詩歌問題思考、探索的理論結晶。這些思考、探索不論是散金碎玉還是自成體系，都是當代詩學的基本內容。既然如此，研究當代詩學，首先就必須找出那些問題是當代入關注的詩學問題？它何以會成為一個詩學問題？當代入

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怎樣的思考和探索？這些思考和探索又呈現出怎樣的表現形態？以及我們今天該有怎樣的認識和評價？凡此種種，本書就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從這些問題出發，來搜集、整理（同時也是闡釋、評價）當代入對於當代詩歌問題的思考和探索。這些問題因而也就成了本書的基本內容。為了從總體上把握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和它的發展演變情況，本書在「導論」部分又從這些問題的歷史聯繫和現實表現的角度，分述其若干特徵，以求最後給予讀者的是一個有關當代詩學的完整印象。

一、現代詩學的歷史轉換

研究當代文學問題，總離不開一個歷史的前提，即它與「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之間的歷史聯繫，研究當代詩學問題，同樣也不例外。眾所周知，「五四」文學革命是從詩歌領域率先開始的。這場「詩國革命」（胡適語）在嘗試白話新詩創作的同時，也引起了一場詩學的革命。胡適等人在海外討論詩歌革命和文學革命問題時，就涉及到了許多詩學問題，例如詩歌的形式（詩體）是在不斷革命的，舊的形式不能容納新的內容；文言是死文字，白話是活文字，死的文字不能創造活的文學等。這些新銳言論，無疑是對中國古典詩歌藝術賴以存在的語言基礎和它創造的獨特的美感形式，從根本上進行了一次釜底抽薪式的顛覆。這種顛覆行動同時也是詩學領域發生革命的先聲和信號。到了「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新文學的先驅者們在對舊文學的文統和道統進行全面清算的同時，也對中國古典詩學（尤其是格律詩學）進行了

更加激烈的抨擊。雖然這期間出於革命和建設的需要，也有對古典詩學資源的點化和利用（例如「以文為詩」和雙聲疊韻的理論等），但從總體上說，卻是以革命為首要之務的。經過了這場革命，中國古典詩學無論是「詩教」的觀念還是涉及具體創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論，都遭到了徹底的否定，或雖未實施正面攻擊，卻被有意無意地「懸置」起來。在「懸置」和顛覆了古典詩學之後，白話新詩在大膽嘗試的同時，也開始了經驗的總結和理論的探索。對早期白話新詩創作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探索也就成了中國現代詩學的最初萌芽。從近代「詩界革命」到「五四」新詩運動，有著兩千多年悠久傳統的中國古典詩歌，在 19 至 20 世紀之交的短短二十年間，從創作到理論，都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從這個時候起，中國現代詩歌在不停頓的藝術追求的過程中，也開始了詩學的理論建構。

就整個 20 世紀中國現代詩學的發生和發展而言，雖然由於它自身的演變和所受影響的因素比較複雜，在不同的時期都要面對一些不同的問題，因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點，但是，20 世紀中國現代詩學作為一個整體，卻是以向現代轉型為起點的，因而詩學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追求，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就是中國現代詩學的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主題。20 世紀中國現代詩學儘管在不同的階段上呈現出千差萬別的形態，經歷過紛紜繁複的變化，但最終的指向都不能不是這個關乎中國現代詩歌發展的價值目標，都不能不是為著實現這個目標對諸多創作問題和理論問題所作的探索和思考。當代詩學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在這個總體趨向上，當代詩學與現代詩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整體的有機的

歷史聯繫，並以它自己的獨特追求方式和獨特的表現形態，構成了 20 世紀中國現代詩學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如前所述，中國現代詩學的萌芽階段，是以對傳統詩學的「革命」為起點的，雖然它從根本上並未完全擺脫傳統的影響，但它的直接的理論資源，卻不再是中國詩歌兩千多年來所積累的思想資料所建構的詩學體系，而是西方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的詩學理論，當然也包括作為這期間西方詩學理論的直接淵源和歷史傳承的整個西方詩學傳統。正因為如此，所以從「五四」時期直到 40 年代，中國現代詩學的主流是追求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目標，尤其是西方 19 世紀的浪漫主義詩學和 20 世紀的現代主義詩學，更是這期間的詩人和詩論家創造各派詩學所取法和心儀的對象。雖然這期間的詩學在某些時候也因為與逐漸成為主流的革命文學的觀念和趣味不合，而在後來的研究中多所詬病，但從總體上說，卻集中體現了這期間詩歌的藝術探索和理論反省的一些積極的思想成果。尤其是以創造社為代表的崇尚自我表現的浪漫主義詩學，以早期新月派為代表的講求藝術規範的格律詩學，以早期象徵派、現代派和「中國新詩」派詩人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學等，更為中國現代詩學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也應當看到，這期間的詩學在吸收西方詩學資源建構各派詩學的過程中，也相對忽視了對本土詩學資源的取用，尤其是在一些現代主義詩學派別的理論中，本土的詩學資源顯得更其貧弱、匱乏。這樣，這期間的詩學在建構一種新的詩歌理論的同時，更加遠離了民族的詩學傳統。這種背離民族詩學傳統的傾向，在這期間的詩學內部也引起了一種理論上的反撥，由這種反撥所引

發的本土化傾向，也就成了中國現代詩學發生歷史性轉換的一股內在推動力量。

早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現代詩學在它的草創階段，雖然以一種激進的反傳統姿態，向古典詩學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但由於傳統根深蒂固的影響，和對西方現代詩學的引進還不夠深入系統，這期間的詩學又常常在有意無意地向傳統詩學吸取滋養。例如胡適最早提出的詩歌革命的主張——「要須作詩如作文」，從詩學淵源上說，就可以從近代「宋詩派」的詩學上溯到「以文為詩」的首倡者韓愈以降的理論影響。胡適鼓吹詩歌革命和嘗試白話詩，也從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中取得了理論支持。至於「五四」時期以浪漫主義為代表的「自然」詩觀，固然接受了西方詩學影響，但與中國古代文化和古典詩學崇尚自然的傳統，顯然也不無關係。甚至連對西方最新的現代主義詩學理論及早期現代主義詩歌創作所作的闡釋，也不得不借助和依託中國古代的詩學資源。朱自清說「象徵」是「遠取譬」、周作人把象徵與「興」的手法聯繫起來，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更不用說諸如「詩言志」等有關詩的抒情本質的理論，「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等有關詩的現實精神的理論，「為歌生民病」等有關詩的人間關懷的理論，以及詩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和詩的意境或境界的理論等等，都被「五四」及其後的一些詩人和詩歌理論家用來闡釋從西方接受過來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和詩歌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詩的心物相應、情景交融等藝術表現手法。尤其是因為「五四」時期的人道主義和「勞工神聖」等社會倫理思想的影響，以及其後日益加深的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傳播，對民間詩歌和民

間詩學資源的發掘和利用，更成了從「五四」詩歌革命直至 30 年代左翼詩歌的一道永不褪色的亮麗風景。此外，還應當包括「五四」以後的詩人和詩歌理論家個人的藝術素質和藝術修養中積澱的傳統詩學的因子所起的潛在的影響作用。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詩學從古典向現代的轉換，雖然是置身於一個「反傳統」的新文化潮流之中，但傳統仍在對新的萌芽起著或明或暗的「呵護」和「支撐」作用。這種「呵護」和「支撐」作用，不但幫助「五四」詩歌革命後的詩學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而且同時也表明，傳統詩學本身也可以向現代發生轉換。這種轉換雖然在「五四」詩歌革命及其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並未引起、也不可能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但卻為中國詩學從古典向現代轉型之後，進一步掙脫西方影響，從「西化」走向「本土化」，提供了一種歷史選擇的可能性。

真正把中國詩學傳統或傳統詩學向現代的創造性轉化問題明確地提上議事日程，並付諸理論研究的自覺實踐，雖然是遠離 20 世紀初的詩歌革命，進入 90 年代後晚近幾年間的事情，但從 20、30 年代開始，用新的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及其後以朱光潛為代表的「參酌中西」的詩歌理論研究等，事實上都是在進行這種創造性轉化的嘗試。只是因為這期間整個文學的現代化是以西方文學的現代形態為標準的，因而詩學研究也就不可能在本土化的方向上另闢蹊徑。加上經過「五四」時期的「反傳統」和後來不斷深入擴大的「反封建」的社會革命的影響，「傳統」尤其是作為封建道統和文統的代表文人「傳統」的「復興」（或曰「死灰復燃」），對於經歷過「五四」文化革命或

正在經歷一場更深刻的社會革命的人們來說，始終懷有高度的警惕。這樣，也就不可能致力於傳統詩學的創造性轉化。

這同樣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所謂「傳統」，並非僅僅是由正統文化或正統文學所代表的歷史——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文學而言，也就是由文人所代表的道統和文統。同時還有一個更加遼闊廣大也更為綿長深厚的民間社會所孕育、創造和涵蘊的一種文化和文學精神的歷史。這個所謂民間傳統雖然也脫離不了占統治地位的道統和文統的影響，甚至是一些根本的和決定性的影響，但由於民間社會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和民眾作為民間社會的主體的獨特社會身份和文化氣質，對占統治地位的道統和文統的影響，又有一種抗拒和過濾的作用。經過這種抗拒和過濾作用，民間傳統較之文人傳統，往往表現出一種更富於原創性的生機和活力，也更富有一種現實的生活氣息。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歷代詩歌在創造力枯竭的時候，往往要從民間傳統中去汲取新的藝術滋養。這一不變的規律，同時也是近代以後的詩歌革命，包括「五四」詩歌革命向民間語言和民間詩歌學習，開發和利用民間詩學資源的一個學理上的依據。「五四」以後所發生的現代詩學的歷史轉換，固然有在進一步接受西方影響的向度上加速和加深詩學的現代化進程的一維，同時也有在創造性地轉化民間傳統的基礎上促使現代詩學向本土化方向發展的一極。而且這後一個方向經由「五四」時期的濫觴和左翼時期的發展，到抗戰時期的根據地文學中，已然成了現代詩學發展的一種主導趨勢。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當代詩學的起點的標誌，在 40 年代的根據地文學中發生的現代詩學的歷史性轉換，